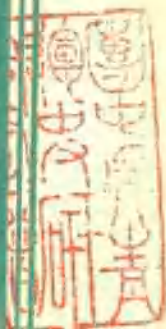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创建问题论文集



•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创建问题论文集

(中国青年运动史研究丛书之一)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

1984.10.

目 录

可喜的收获(代序)	郑 洸(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综述)	
.....	郑 洸 罗成全(1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及其前后的若干问题	赵 朴(26)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初探	
.....	刘心勇 王 敏(40)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早期活动	
.....	陈泰生(55)
试论毛泽东同志早期的建团活动和建团思想	
.....	谭冬梅(71)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	汪成旺(100)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	曾建昭 陈善光(114)
也谈广州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	陈家文(131)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初探	谭冬梅 (143)
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其 活动	董振修 (156)
唐山早期青年运动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李润平 么春雨 梁 斌 (169)
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太原的创建问题	岳晓辉 (180)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董舒林 孙 运 张战物 (188)
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活动简况	薛国恩 (199)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山东的创建	向 昌 (211)
安庆建团的经过及其活动	杨黎光 (223)
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早期发展 及其活动	陈立明 (229)
福建早期团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主要 革命活动	陈晓光 (254)

可喜的收获（代序）

郑 洗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是我国青年运动中的头等大事，彻底弄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是研究团史和中国青运史中的首要问题。

然而，由于建团时间离现在较久，已有六十多年；由于当时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秘密建团，各地建团条件迥异，整个建团情况较复杂；由于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本来不多，后经白色恐怖的破坏与长期战争的洗劫，至今保留下来的极少；由于当年参加建团活动的人物，绝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少数幸存者，也均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许多情况，很难作全面、准确回忆。因此，要完全地、彻底地搞清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情况，把史料立准、立好，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可喜的是，在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经过全国广大党史和青运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广泛深入查阅、考证各种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访

问、调查了许多当年参予过团的幸存者，现在已基本上弄清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情况。我们编印的这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就是这一成果的集中体现。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和广东省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在广州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讨论会。全国最早建团的地区的青运史工作者与有关党史工作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交流了各地掌握的有关史料，共同讨论一些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具体地说，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讨论会取得了五方面的成果：

第一个成果是，在史料占有和查证方面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例如：

(1) 团的“一大”情况在史料占有和查证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赵朴同志在会上的报告，帮助我们弄清楚了团“一大”会议的时间、地点变动的原因（“一大”开始准备在上海开，时间是四月一日，后来改到广州开，时间是五月五日），查清了出席代表的名单和所代表的地区，以及一些地方建团的时间。还有前不久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的曾建昭同志和华南工学院陈善光同志，在北京找到了据初步判断可能是陈独秀在团“一大”的讲话。陈独秀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大会是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一个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然后就讲了两大精神。从这个材料的记录时间看是五月五日，登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广东群报》上。可见讲演是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作的，也

就是说和团“一大”时间是吻合的。他讲的有两个大会和我们团的“一大”当时情况也相吻合。但是，我们只能说是“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广东群报》并没有注明是陈独秀在团的“一大”上的讲话。又如，团的“一大”决定加入少共国际的问题。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团“一大”加入少共国际的正式文件。现在我们找到了少共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封信。信中指出：“青年团最初一期分子非常复杂”，“此等复杂分子往往混乱你们团体的阶级性。你们毅然反对此等分子，因此日益巩固，做得非常恰当”，“到你们第一次全国大会时，你们此种肃清团体的工作，大致已完。你们那次大会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决定革命的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决定加入少年共产国际是绝对合格的。从此就是我们亲密的国际团体中之正有平等权利的分子。”这封信表示同意我们加入少共国际。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关“一大”材料带有突破性的新发现。

（2）在前一段，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各个地方从中央档案馆、从一些档案部门发现了早期各地团员的调查表。这些发现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判断各地什么时候开始建国很有帮助。当然这些团员登记表中也可能有差错，比如湖南的团员登记表中，有的团员入团时间就不准确。但我觉得这个发现还是很重要。

（3）是各地早期团章的发现。现在发现了很多地方的团章，广州的、武汉的、天津的、四川的、旅欧的等等。遗憾的是，还没有发现张文亮日记中讲的，由北京或上海寄给

毛泽东同志的那份团的章程。如果这个团的章程被发现，那么，要比这些地方章程的发现更重要，对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建团问题更有意义。

另外在查证材料方面，我觉得也有所前进，至少排除了一些没有根据的传说和说法。比方说上海团的发起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团的创始人的问题。从团“一大”那个文件里边讲到有八个人。这八个人是谁？过去一直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全的名单，现在我们看到了。但是这个问题要查证。仿鲁写的《清算陈独秀》这篇文章中，对青年团怎样酝酿建立的，陈独秀等人怎么商量建团的，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民八陈独秀自北大……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以及《星期》评论。无政府主义者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住霞飞路716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的思潮汹涌，倡无政府主义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陈独秀及季陶等决定，约集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当时以法租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两人之与法租界有关系者出面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为团址，并办外国语学社

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这个材料是我们看到的最详细的八个人的名单。在这个材料里仿鲁有一个括弧说明，在说明之前有一段话：“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尚有日人板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韩人安某等参加之”。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仿鲁特别用括弧说明，日本《劳动日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板西之作。这个事情我们需要查证。但我们总算看到了八个人是谁的名单。

另外，关于恽代英、肖楚女在一九二〇年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这个问题搞得很混乱。我们大辞海中有关恽代英的条目就写了这一条。后来纪念恽代英逝世四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者按就这么讲的，我们《中国青年报》也照着这么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林谷良同志，经查证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澄清了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这个误传可能是由刘光同志一篇文章引起的。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一九三六年一位团中央领导同志在陕西保安和斯诺谈话的时候，就是这么给斯诺介绍的（可参见斯诺的《中共杂记》第八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这位领导同志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央团校讲青运史时，又这么讲。从这件事中我们联想到，大概在三十年代很多老共青团干部就是这么流传、这么讲的，因而一直延续下来。这件事情现在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了，就是认为恽代英、肖楚女从当时他们各方面的情况看，都不可能参加上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还有张太雷包不包括在一九二〇年上海团的八个发起人

之中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同志倾向于不包括。

再一个是瞿秋白是不是同达林、张太雷一起筹备过团的“一大”，这个问题引起史学界同志的关心。因为这个问题还关系着党史中瞿秋白是否参加西湖会议的问题。现在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不可能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以前秘密回国。材料证明，一九二二年四月中下旬瞿秋白还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里养病。瞿秋白在自叙传略中说，他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回国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达林记混了。因为瞿秋白同志一九二三年一月回国以后，的确参加了青年团的“二大”。达林可能把“二大”和“一大”搞混了，这还有待查证。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种进展。

此外，在有些地区，也取得一些新的进展。比方说广东近期来发现的几件东西，对我们青运史研究是有好处的。一是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二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湖南特别有意义的也是两件：一是团员调查表，可以说明毛泽东同志的确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开始建团。从那个登记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最早入团的有彭平之，他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入团的；二是谭冬梅同志讲到的，他们找到了一个早期的团员李穰。武汉、天津等地也都有新的突破。

第二个成果是，在查清建团史实方面，掌握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这里我只讲四个可能对全局有影响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件东西登载在《远东人民》一九二一年第四期。这件东西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因为这个材料里告诉我们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原来我们只知是八月，不知具体日期。我们设想这个报告既然讲到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具体时间，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情况，所以我们要尽快设法查到这个报告。

第二条线索是上面我们提到日本板西多郎在日本《劳动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从仿鲁《清算陈独秀》文章中引的那一段文字看，仿鲁可能看到了这篇文章。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年哪月的《劳动月刊》这就大海捞针了。但我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进行查证。

第三条线索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第一任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这篇文章是工作报告述评，登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一九二一年第二期上。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文章中有这么一段：“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广州、武昌和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肖三同志五十年代写的文章谈到团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胡华、肖效钦在《百科知识》那篇文章中又说团正式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他们根据的就是这个材料。这个人的有关文章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线索。

第四就是团临时中央局什么时候成立的线索。关于团临时中央局何时成立这个问题是我们团早期创建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了团的临时中央局后，各地青年团的活动就不仅受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而且还要受团临时中央局指导。这个问题对各地研究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以及成立后的活动来说，是需要联系起来考虑的，所以我们很重视

有关这方面的线索。赵朴同志讲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签发的那个中央通告中，讲到青年团要按新章程来办事。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在陈独秀签发这个通告的时候，团已经有了一个新章程。这个新章程是不是《先驱》第五号（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公布的临时章程？从时间来看，好象接近这个临时章程。临时章程有这么一条规定，即团中央没有正式成立之前，以上海团的组织代理中央职权。这是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这个重要通讯是通知召开团的“一大”的时间和地点的。而它是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发出的。从这个线索中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分析，即团的临时中央局成立的时间应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之间。总之这些线索对搞清团的临时中央局成立时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进一步予以查证。

第三个成果是，各地在掌握大量史实和查证材料的基础上初步就团创建的历史条件、经过和特点，创建团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写出了一批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的专题文章，这对我们搞好这个专题，立准立好这个专题的资料打下了基础。

第四个成果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团的创建史研究和探讨方面有一些好的做法。这些好的做法主要有：（1）注意联系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来探讨建团的客观必然性。（2）各地在探讨具体建团条件的时候，注意结合本地的情况，分析建团的原因。既注意政治经济的情况，又注意到青年思想发展和变化。（3）把建团和建党以及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就建团研究建

团。（4）在研究建团组织准备的时候，注意研究建团前的各种青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即联系到建团以前，经过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后，本地区有哪些青年组织，研究、探讨和了解他们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而不是割断这个地区青年组织发展的历史。（5）在评价自己地区团组织历史作用的时候，注意从全国的全局出发，防止了片而看问题。

第五个成果是，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应该防止的问题，以及我们在编写团的创建史的时候应该回答的重点问题。从事青运史研究一要坚持史为今用的方针；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三要坚持史论结合的方法。我们应该防止两种倾向：一要防止繁琐、面面俱到。我们在广泛征集资料当中要注意抓关键性的资料，要注意抓关键人物“活资料”的抢救，也就是说要集中，要突出重点，要分清主次。二要防止简单化。一是不不要抓住了一些材料就下判断。我们在作判断时一定要谨慎。另一点是，我们在论述的时候不要抽象化或概念化。我们要坚持论从史出。

团的创建时期应回答的重点问题，我认为是：

第一、为什么要建团？这里要讲清楚在二十年代的旧中国，为什么需要建立青年核心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要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需要，从中国青年的特点和它的地位来论证建团的客观必然性。要注意体现胡启立同志在团“十一大”代表党中央祝词中讲的两条历史结论。就是说我们党要进行革命必须依靠青年，而青年要发挥作用，要作贡献就要党的领导。

第二、怎么建团。革命先驱者们当时没有经验，在那么困

难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针、思想来指导建团？我们要研究李大钊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建团思想。这次讨论会有个不足的地方，没有很好交流旅欧建团的情况，而旅欧团组织在我们团的创建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欧团组织替我们党培养了许多人才，今天还在领导着我们党和国家。（在会上，谭冬梅同志提议在四川举行一次有关旅欧团组织创建的专题讨论会，得到大家一致的赞成，我们将委托四川团省委的同志积极筹备召开。）这个问题要很好研究，我们要从老一辈、革命先驱建团思想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来指导我们今天共青团的建设。

第三、团的创建时期有哪些好的传统，好的精神，好的作风应该予以发扬？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不但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注重实践，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纯粹地当作学问来研究，而且用它来指导革命斗争，改造社会。我们革命前辈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开始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问来研究。如果说当时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中发生分野，我看就和这个有关。一种人也学马克思主义、也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只作为学问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只看作书斋里的东西。我们革命先驱者与他们不同就在于，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中国的宇宙观，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其次，就是坚定对共产主义、对党的信念和献身的精神。这在这个时期是表现得很突出的。再次，就是他们和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精神等等。

第四、建团的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早期建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有什么经验、教训呢？有什么值得我们

借鉴的地方？我们体会有三条：一条是旗帜要鲜明，思想要统一。这就是要注意思想上建团。第二条是加强党的领导，这一点在早期党团关系中，特别是在党成立以后是很突出的。第三条是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斗争中建团。各地都注意吸收那些经过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入团。

这本集子里的文字，绝大部分是在广州会议上讨论、审议过的，只有小部分文章，是在广州会议外、会议后撰写的。

虽然，这本集子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论文汇编，以较翔实、较丰富的史料，阐述了上海、北京、长沙、武昌、广州、天津、唐山、太原、济南、杭州、南京等地以及旅欧青年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全过程，并初步探索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早期建团思想。但是，尚有一些重要史料极待我们进一步调查考证，如上海、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团章，各地团组织的第一批团员还没有搞清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等，尚有一些重大理论亟待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如早期建党建团的思想基础与阶级基础有无异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成长的规律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团组织？早期建团活动有哪些经验教训等。

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另一面尚存一些重要史料与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决定集资铅印这本内部发行的文集，积累、资料交流信息，以期引起各地、各界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的重视与研究，务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前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创建（综述）

郑 沅 罗成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它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青年团的创立作了准备。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为建团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革命青年，为建团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建团有了直接的领导。

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
开展建团活动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

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

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建团。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除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指导各地建党外，还进行了建团工作。它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八个青年一起，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俞秀松担任书记。

这时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进步青年对旧社会不满，怀着爱国热情，脱离家庭，离开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谋求出路。上海团组织便从中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罗觉（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李中、李启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梁柏台、卜世崎、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等。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发展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谷林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②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选派青年赴苏俄学习。一九二〇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就在团的机关——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威经斯基的夫人任俄语教员。一九二一年春，这个学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肖劲光、何今亮（汪寿华）、王一飞、傅大庆、彭述之、许之桢、梁柏台、卜世崎、柯庆施、华林等。